

论文化和艺术

艾思奇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9/11
DESS/ES

论文化和艺术

艾
思
奇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906348

906348

责任编辑 何光汉
封面设计 李洪涛 高汝法

论 文 化 和 艺 术

艾 思 奇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4 字数：185千

198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8,300册

统一书号：10157·145

定 价：0.95元

前 言

艾思奇同志在我们见面以前，我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并且看过他写的《大众哲学》。这是一本早期宣传辩证唯物论的通俗读物，在青年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导青年走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延安，又读过他发表的许多关于文化、艺术的论文和杂文。这些文章，大都紧密结合实际，文字通俗，观点明确，说理清楚，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文化战线上的得力之作。现在时隔多年，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人们常说，文如其人，确实这样。我对艾思奇同志的为人，也有很深很好的印象。只要一谈到他，我总是不由地升起敬重和怀念的深情。

一九三九年冬天，我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中宣部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洛甫（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要调我去边区文协工作，同时兼筹办延安文化俱乐部。我到陕北已经三年了。三年来开始是做点文艺组织工作和编辑工作，接着是学习。这时，我很想专门从事写作。但在这里，好象还没有人不工作而专事写作的。我那时很单纯、很幼稚，只以为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尽管我想写作，但对成立文化俱乐部究竟要做什么，脑子里一点影子也没有。我去中组部转组织关系时，

李富春同志也给了我鼓励。我带着简单的铺盖、换洗衣服、日用什物，由兰家坪马列学院涉过延河到杨家岭后山沟的边区文协去报到了。那时边区文协的主任是艾思奇同志，柯仲平是副主任。住在这里的，大约有二十来个“文化人”。

李富春同志同我谈话中，有一句话曾使我很担心。他说：

“你在西北战地服务，做团结工作还是有经验的。边区文协有一些文化人，需要有一个经常住在那做日常工作。”是的，艾思奇同志当时住在中宣部，也在中宣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柯仲平同志领导民众剧团常常下乡，也不在家。现在把我调去住机关，我将陷入一些无休止的人事问题中。这怎能创作呢？我听后，心里惴惴不安。可是，我到了文协，相处一阵之后，我感到大家相处得很好，很和谐，同志们彼此亲近，根本没有什么令人烦恼的人事纠纷。这里党员数目少一点，但是几个非党员都表示渴望早日解决他们的党籍问题（后来也都陆续解决了）。我细细观察，细细思索，我觉得机关里这样团结和睦的气氛，是同领导人艾思奇同志的工作作风和为人的品德很有关系。艾思奇同志是一个温和忠厚的人，遇事从不急躁，对同志诚恳和气，凡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他向我介绍文协每个同志的思想生活和来历，总是说他们的好话，长处。我知道的确有几个同志因为和原单位处得不好才要求调来的。来文协之后，他们生活得很平静，都兢兢业业工作，埋头写作。另外一些同志，是从国统区到延安由中组部介绍来的。一位学哲学的同志在机关管总务，隔三天给大家发一次蜡烛。每当他在窗外叫唤：“发蜡啦！”我心里就感到一阵歉意，急忙放下工作，

跑出窑洞领蜡。一位学历史的同志管理图书室，书籍不多，整理得很有条理。机关开始只有一个老炊事员，一个事务员，一个勤务员，其余事都由这些所谓文化人自己担当。艾思奇同志过几天，或一个星期来一次，同大家开会谈心。他对我是完全放手的。我刚到文协，没有名义，大家把我当作副主任。一九四〇年，边区开过第一次文代会以后，由吴玉章同志担任主任，艾思奇和我担任副主任。这时因为他的工作多，文协的事，他管得少了，却仍很关心机关的生活，遇事找他，他都尽力帮助解决。我们相处一年多，我有缺点和弱点，从来也不用担心他会趁机整人。他从来也不会，也没有向上级领导谎报军情，背后说同志的坏话，或者用笑谈方式在领导同志面前讥讽同志，造成对一些文化人的坏印象。他是一个好党员好领导，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看，全文协的同志都有类似的想法。他和我，还有师田手同志、雷加同志、吴伯萧同志等一块工作，和衷共济，患难与共，环境再艰苦，条件再差，工作再紧张，大家心里始终是高兴的。我调到解放日报社，主编文艺栏，和艾思奇同志来往少了。一年以后，我调回文抗，参加领导文抗机关的整风学习，常去中宣部，又常碰着他。他还和先前一样，他不是一阵热、一阵冷的人，也不是一阵风、一阵雨、随风转舵的人。象他这样正直的人，即使在延安，也并不是普遍的。人的一生最难的就是在死后，在离世很久之后，当人们再想起他，谈论他的时候，却总也想不到、找不出他有什么不好，和对不起人的地方。艾思奇同志在文协工作岗位上百多年，身居要职，并不煊赫一时，从不令人生畏，而只是令人

怀念，深深怀念。我想，革命者还是应该取这种忠厚，而不会去羡慕那些权势和权术。

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里，曾提到艾思奇同志。这部小说能够于一九四八年在大连出版，艾思奇同志是尽了力量的。那时他受胡乔木同志的委托，审阅这本书的原稿。他读了之后，给过我很大鼓励，说这本书是最早地最好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建议有关方面早日出版。他不会说假话。他是用欣喜的神情同我谈这些话的。多少年的同志式的关心和感情，使我感激。我很愿意和这样的同志相处。可惜，因为工作关系，我们还是分开了。全国解放后，我们见面就更少了，虽然彼此仍然很关心。前年我从东北农村回来，找寻一些老熟人时，其中艾思奇同志已不在人世多年，再也无法见到他了。

我回来后，王丹一同志曾几次来看我，见面时，自然要谈起艾思奇同志，谈起他的书。我早就想写点回忆艾思奇同志的文字。现在趁他的这本集子出版的机会，我很愿意写几句话，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丁 玲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

17892-3

目 录

前言·····	丁 玲 1
新的形势和文学的任务·····	1
文学论争所得到的结果·····	9
文艺家协会成立之日的感想·····	17
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	20
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	25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32
论思想文化问题·····	36
文化在抗战中·····	53
谈谈边区的文化·····	57
抗战文艺的动向·····	60
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	77
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	80
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	106
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	120
弄文艺的人要注意宪政运动·····	127
旧的恶习惯应该抛弃·····	130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	133
群众需要精神食粮	139
美术工作与群众的进一步结合	143
改变面目改变脑筋	146
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	150
文艺的永久性与政治性	155
“诗人自己的道路”	172
海涅的政治诗	184
论文学的鉴赏	192
形式与内容	208
论文学的素材题材和主题	213
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	221
身边琐事与伟大的远景	230
谈谈现实主义	234
文艺创作的三要素	237
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	246
《日出》在延安上演	257
《惯匪周子山》	261
一个哲学家的文化艺术论	263
后记	280

新的形势和文学的任务

现在再没有人把什么永久的东西当做文学描写的对象了，再没有人说文学是超时代现实的神品了。因为这只是被时代遗弃了的没落者的失望的自遣，是无力正视现实的一种粉饰。

前进的文艺作者都承认，文学是，而且必须是跟着时代变化，时代的一个新的形势必然要在文学上提起新的任务。

文学是怎样担负起它的时代任务呢？文学能担负起这任务，就在于它是现实的反映。就象科学用理论反映现实一样，文学用具体形象把现实的一切动态反映出来。所谓反映，并不是零零碎碎毫无系统的陈列，而是要把现实的运动、趋势、前途，也显示出来，不单只反映现实，也同时预示着将来。这就是说，正确的反映，同时也就是指示。在人们拚着苦痛，拚着血肉去争取更好的未来的时候，文学是和科学一样，对于他们的行动要尽相当的指示作用。

时代的新的形势，不但对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对象、新的美学的基础，同时也把需要解决的新的问题摆到作者的前面。最能反映现实的文学，是最有时代意义的，也就是最有行动的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的生命就是现实主义。凡有价值

的作品，都有它的现实主义的一面。我们自然不能说每一个作者都是现实主义者。相反地，我们要说，多数的作者甚至于伟大的作者，都常常站在一种特定的立场，戴着特定的棱镜，也就是抱着一种代表作者的社会地位的世界观，而把现实的形象歪曲了。在特定的世界观的着色眼镜之下，作者甚至于会把现实的材料拖到非现实的空中去。但不论怎样，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那价值不在他的世界观，而在那虽然被歪曲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了的现实的内容。我们承认《雷雨》这部戏剧是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它里面写出了几个很现实的人，象那在旧社会、旧道德的压抑底下苦闷着的周蘩漪周萍等人物，就是在现在的中国也有很多地方存在着的。作者的世界观使他想把这些人物带到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彼岸里去，但也幸而这神秘主义和宿命论没有完全压坏了这几个人的真实的描写，才使剧本有深刻动人的力量。

这是一些基本理论上的问题，为什么要拿到这里来谈呢？这是为要表明，凡是有才能的作者，在世界观上即使有种种不同，但在反映现实的这一点上，却多少都有值得重视的地方。也就是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被提起的时候，文学的事业并不单单是最前进的作品才能推动；就是比较落后的作者，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可以成为这任务的一部分的担任者的。

我们的前进的文学界常常有狭隘的关门主义的倾向。他们带着前进者的骄傲，把自己当做唯一的挖掘现实的工作者，而忘却文学战线上还有其他可携手的友人。这错误，是在于把文学看作少数人的事业，看做天才的事业，不知道文学所要反映的具

体现实，是非常广泛的、多方面的。一部分最前进的作者虽然能把握着现实的最本质的方面，却并不能汲尽现实的真实性。如果我们对于文学不仅仅以较片面的反映为满足的话，就应该从更多的作者中去找寻合作者。我们当然不能幻想要一切的作者都成为我们的合作者，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每一种新的形势到来的时候，除了少数最前进的作者之外，还站着许多有才能的可以合作的作者，却是无疑的事。我们可以放弃了他们么？如果放弃了，他们将依从着那不正确的世界观的引导，渐渐走向衰败没落的道路上去，在文学上说，这也不能不算是很大的损失。如果我们明白，担负时代任务的力量是一点一滴也不能让它白白丧失了的话，那就应该号召他们，鼓励他们，督促他们，让他们少用些工夫在那不正确的世界观方面，多用些工夫在现实的反映方面。

因此，依据着新的形势来给文学规定任务和口号，并不是单限于少数最前进文学者圈子里面的事，而是要把更广大的作者拉过来，用集团的笔，全面地写出现实的真相和现实发展的前途和道路。政治上的联合战线，在文学上也有反映，不单只是行动上的反映，也是写作的反映。

在目前的新形势之下，我们要的是什么口号呢？有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人提出“国防文学”，我的意见，是赞同国防文学这一方面。因为这口号是最切合现阶段的需要，而且也最能号召一切可能的写作力量团结到民族革命的阵营中来。

要明白这一点，对于新形势不能不先有一个明白的理解。

新的形势是在于民族危机的加紧，半殖民地的中国已经就要被东方帝国主义者全殖民地化了。殖民地化的企图，自然不是从今日开始的，我们可以回溯到“九一八”，不，还可以回溯得更早一点，说：在田中内阁所造成的济南惨案^①时代就已经发端了。这就是说，从七八年前起，在中国已开始了被殖民地化的过程，这过程是到最近一年才更加深刻化起来的。这深刻化是不是引起了新的特质呢？引起了的，现在的民族危机已经发生了新的特质，也因此才有新的形势。有人以为“九一八”以来的中国只看见整个的殖民地化的过程，只看见殖民地化的程度上或数量上的增加，而忽视了最近一年来的新的质的变化，这是不对的。所谓新的特质，一句话，就是民族的危难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在这以前，敌人的殖民地化的企图还只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而现在却逼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它逼着中国，或是抗战，或是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全都被敌人吞下。

更具体地说，这新的形势包含着以下几点：

第一，敌人是集中一切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各方面力量来对中国作全面的侵略，侵略的魔手几乎没有一个角落里不伸张到，也就是几乎没有一个角落里的中国人不感到侵略的威胁。

第二，驻军的增加，走私的扩大，以及其他新的、毒辣的侵略方式，使那些甚至于想做汉奸或想做王道顺民过太平日子的人也感到了威胁，使许许多多的阶层的人都渐渐地感到抗争的需要。

第三，因为敌人的侵略已经到了要全灭中国的地步，在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的前面显现成一个最危险的大敌，不先克服了这个大敌，大家都要同归于尽。因此，除了极少数甘心做汉奸的人外，相互间的纷争，都觉得要设法和缓下来，共同联合一致，对付最大的敌人。这就是抗敌联合战线发生的基础，也是新形势中最重要的东西。

谈新形势而忘记了联合战线，是不对的，就是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理解，也是非常有害：联合战线是不是要解消了社会的一切纠纷而不谈呢？不是的，人民所受的封建的压制和经济的剥削，没有丝毫改善，这会减低了他们实行抗敌战争的热情。然而联合战线是不是仅仅把过去的一切社会纠纷统一着呢？也不是的，内部的激烈争斗照样继续下去，怎么有力量来对付外来的大敌？如果说联合战线是仅仅统一着这些纠纷，那就等于根本不要联合战线。联合战线是以抵抗大敌为目的，在联合战线之下的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得要以抗敌联合的利益为前提：某种社会纠纷如果损害了联合战线（如过高的社会斗争口号，会把一部分战友吓退），那我们宁可不用激烈的形式而用改良的方式来解决这纠纷；某种社会纠纷如果对于联合战线有利益的话，当然要不客气的解决这纠纷。在新形势之下的社会纠纷和过去的社会纠纷，在解决的方式上是不同的，忽略了这一点，也就谈不上对新形势的了解。我们不能说封建势力（如小地主甚至于军阀之类）一定都是汉奸，我们不能说压抑着劳苦大众的人（如民族资产阶级之类）一定都不能走到联合战线上来，这是机械的了解，不是动的辩证法的了解。在新形势新

条件之下，这一类的人也有一部分可以转向到抗敌的战线上来的，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转向是带着很多的踌躇、动摇和疑虑的成份。

为什么在这新形势之下，在文学领域里我们要赞同国防文学的口号呢？因为这口号是文学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可以号召广大的作者来尽他们的时代任务，而不把这任务局限于一部分前进者的圈子里。

一个作家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层。这社会层如果是一些寄生者集团，他们脱离现实，脱离生产，做着高超的美梦，那么，代表他们的作者也会跟着他们播弄文字技巧的粉饰和欺骗。如果这同样的社会层在新的条件之下受到了现实的打击，感到了地位的不安，在疑虑和彷徨中渐渐倾向到抗敌的方面来的时候，代表的作者把这样的转变过程反映出来，这不但在文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同时在社会的意义上，他们的作品也对他的阶层尽了一种指示的任务。它对他们说：“看吧，我们的路只有这一条，抛弃了那美丽的空想，走到联合战线上来吧！”象这样的作者和作品就是单单站在政治上来说，我们也能放弃了吗？

我们相信在新的形势之下，有许许多多这样可能的社会层，也有许许多多这样可能的作者。我们在政治上要用联合战线的口号把这些社会层尽可能地号召到抗敌战线上来。在文学上，我们得要用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这些作者，叫他们去指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层，把在迷梦中的人惊醒，把在彷徨中的

人坚定起来，使他们知道为国防而战是比什么也更迫切需要的事。因为国家亡了，自己的生存就全没有保障。

广泛的各种社会层中的转变中的现实，不是一部分前进的作者所能汲尽的。前进的作者在作品中所做的指示，也不一定能够说服那比较落后而又有走到联合战线来的可能的人们。用他们自己的作者去说服他们，是最便利的事。要把各党各派的作者号召起来，意义也就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要赞同国防文学的口号，而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恰当？因为这一个口号用在现阶段里太狭隘了。提出口号的胡风先生，是把着眼点完全放在“劳苦大众”上面，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抗敌的可能力量不只是“劳苦大众”，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小地主以及小资产阶级，都有走到抗敌阵线上来的可能性。胡风先生说：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说明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这样的见解现在已经旧了。现在已经不能一概地说谁一定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现在的形势使我们可以说：可能成为民族奸细的人以及对于民族抗争不感到兴趣的人，也渐渐转向到抗敌联合战线下面了。我们现在不但可以说明民族的利益和劳苦大众的利益的一致，我们现在还可以说明，民族的危亡，对于其他的阶层和利益也是有害的，凡是真正要争取生存的人，都应该走到抗敌战线上来，实行保卫国土，收复失地。

我们现在不单单要说明谁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谁是克敌

的主要力量，还要指出更广大的国民是怎样渐渐走到联合战线的组织里来，怎样在动摇、彷徨和疑虑中终于转变过来，而形成抗敌的伟大力量。

这样，展开在我们的前面而值得文学来反映的现实，是更广泛了。这样广泛的现实的动态不是一部分前进文学者所能完全汲尽。要号召更多数的作者来和我们前进的作者合作，不是很必要的么？

对于这些作者的号召，自然也不是毫无条件的。他们走到联合战线上来，无疑地也随着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无疑地他们仍不会完全脱去了旧的恶习，文字技巧的粉饰和欺骗仍会在他们的作品里残留着。因此，把这些作者号召过来，同时也要给与战友的批评。号召的意义，就在于要不使他们放任在自然生长的状态中，以至于有腐化的危险，而要把他们中间的新鲜的生命扶植起来，要他们对于自己阶层的转化的现实过程的反映多努力些，而在世界观方面少来一些顾虑。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上海《文学界》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注 释

① 济南惨案。也称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济南，残暴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造成惨案。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军被迫于次年撤出济南。